

曾庆延

(1958–1959)

大象出版社

676

大象人物日记文丛

曾庆延
北大荒日记
(1958—1959)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荒日记(1958—1959)/曾庆延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5. 4

(大象人物日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3797-4

I. 北... II. 曾... III. 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2250 号

 北大荒日记(1958—1959)/大象人物日记文丛

丛书主编 李 辉

作 者 曾庆延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方 丽 霍红琴

装帧设计 王翠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艾乐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8.5

字 数 112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12.8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6202901

『大象人物日记』	文丛总序	李辉
----------	------	----

这几日，“非典”在北京肆虐。天上似乎总是罩着久久不散的雾霭。说是雾，却非雾；说是晴，也非晴，太阳遮遮掩掩地露出来，它也仿佛被某种莫名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

生活仍在继续，但是一夜之间已与以往大大不同了。

生与死、勇敢与怯弱、高尚与卑微、果断与无能……人性的诸多美好与缺陷，都在这一时刻呈现出来。

对于生活其中的每个人来说，这些日子将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未来的人们回望今天，也许会说：那一年中国的春天叫“非典”；正像今天的我们在回望一个又一个遥远或不遥远的年份时，会用特定的词汇来勾画历史的某一个环节一样。

在这样特殊的时刻，有人在每日记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就像我们的前辈们当年一样。

日记就其本来意义来说，是最具个人色彩的一种文体——这里需要排除某些刻意写给世人阅读的日记。因为诸如此类的文字，看似个人化，其实早已串了味。那些为了迎合某一需要而写，或者被人为加工的日记里，很难看到记录者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它们的价值，无论是文本上的还是美学上的显然是要大打折扣的——我所看重的是真正写给自己的日记。打开日记本，写下一行行文字，或是为了备忘，或是与内心交谈，把个人交往、行踪以及高兴、痛苦、愤怒诸多心绪均如实记下。这样的日记，无论简略或者详尽，

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成为历史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认识记录者本人和历史提供大量真实细节。

“大象人物日记文丛”将陆续选录不同时期各界人物的日记,借他们对个人经历和心灵行程的记录,来多侧面地呈现历史原状。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身份会留下不同风格的日记,从而也展现出历史生活的不同侧面。我很高兴在大象出版社的支持下,能够出版一套自成体系的日记丛书。我希望经过不断的努力,能有更多有价值的日记加盟到这套丛书中。

一个新的开始。既是文化积累,也是历史积累。星星点点的积累,把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

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春天,谨以上面的文字作为“大象人物日记文丛”的总序。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前言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我在北京中央农产品采购部生产企业局被划为“右派”，定为五类。受到降两级和开除团籍的处分。1958年初春4月，随中央国家机关的“右派”们，一起被送到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850农场“劳动锻炼”。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劳动，经评议符合“确实改造好了”标准，于1959年11月底被宣布“摘掉帽子”，回到北京另行分配工作。适值国务院所属部委机关进行精简机关、下放人员的时候，于是，我们这些“重新回到人民队伍”的“摘帽右派”，理所当然地又被下放到了祖国的边疆各地。我来到云南玉溪，从此安家落户四十多年。1979年1月，经中央商业部复查落实政策，改正了“右派问题”，恢复了原来的级别和团籍。

我自1951年参军后就开始写日记。半个世纪以来，除了“文革”时期被迫搁笔之外，一直没有中断（当然其中不一定每天都记，几天写一次的也有不少，但都保持着连续性）。到北大荒“劳动锻炼”时，尽管劳动艰苦，时间很紧，但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所以还是坚持把日记写下来了。近两年的时间，写满了一本硬壳笔记本。这些年来，我将它和其他二十多本日记一样，好好保存着。只是自己有时翻开看看，从如烟的往

事中,寻觅自己人生的足迹,思索世事的沧桑,缅怀再也见不到的亲人和朋友,从未想到要公之于世。

1998年底,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收获》上读到作家李辉写的《悲怆北大荒》,及画家黄苗子先生的《北大荒家书》,勾起我许多难忘的回忆。但我发现黄苗子的文中,可能是因年代久远,对修水库的情况记忆有误。于是,我就写了一封长信,请《收获》编辑部转给李辉先生,根据我日记记载的情况,作了一些说明。不久就收到了李辉的复信。他除了对我去信订正表示感谢之外,还谈到他与我大哥曾卓已有二十多年的友谊,以及希望我把在北大荒时写的日记整理出来,寄给他看看。我便于1999年1月,将初到北大荒时的几篇整理好寄出了。几年过去,没有收到李先生的回音。我想,我那些日记可能没有多大的价值,李先生又是个大忙人,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没有再去打扰他。哪知今年3月,突然收到李辉先生的来信,说是他正主编一套日记丛书,嘱我将全部北大荒时的日记整理出来给他。我这才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日记重新整理了一遍。内容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订。

说老实话,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始终是信心不足的。我觉得这些日记虽然真实地记录了我在北大荒的一些经历,但与我见到的那些关于北大荒“右派”生活的纪实文章(如戴煌的《流放北大荒的“右派”们》)相比,就深刻性、全面性而言,就太逊色了。这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怀着无比悔恨的心情,想在严酷的劳动中,改造自己的灵魂,赎回自己的“罪过”,而写出的忏悔录。今天读起来,连我自己也感到丝丝的不安和羞愧。

然而,我也从另一个角度想过:作为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我那时的见闻、那时的思想、那时的表现、那时的价值判断,毫无疑问是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如果了解历史的复杂真相,剖析人性的软弱和怎样被异化,这些日记作为原始的材料,也许会有点用处。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轰轰烈烈开发北大荒的史实,至今还少为人知。正如李辉先生说的那样:“右派”的加入,在这场中国垦荒史上值得大书特

书的垦荒运动中,添加了几抹浓重的悲怆色彩,但它毕竟是一次伟大的壮举。不管出发点和动因如何,北大荒人在改造大自然的同时,也锤炼了自身。多数的“右派”通过炼狱也变得更纯净、成熟和坚强。日记中的点滴反映,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1999年时,为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用的是别林斯基的一句名言:《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文中我写道:“从我个人来说,因‘右派’问题,我被取消了已录取为北京大学1957届新生的资格,上了另一所‘北大’,这是不幸的。但对我经受磨难而成长和丰富人生的阅历来说,又未尝不是‘最好’的呢?就整个国家来说,发生诸如‘反右’、‘文革’这样巨大的灾难,的确是更不幸的。但当付出了饱含着血泪的‘学费’以后,拨乱反正,获得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时,我们不是也可以视那些巨大的不幸,是让民族觉醒的一所‘最好的大学’吗?”

曾庆延

2004年5月5日

目 录

⊙

前言

• 001 •

⊙

一九五八

• 001 •

⊙

一九五九

• 043 •

⊙

附：北大荒放歌

• 107 •

1958年3月22日

前天下午,牛处长把我从罐头厂^①叫了回来,通知组织上关于我的处理决定:行政降两级,开除团籍,去东北密山县国营农场劳动。说实在的,我真高兴极了。参加体力劳动,是我犯错误以后衷心所盼望的事。我也曾几次向组织上提出了要求。原先我还怕罐头厂因工作需要不会让我走,但现在居然如愿了。组织上让我去参加体力劳动,使我对改造自己更有了百倍的信心,摆在我面前的该是一条多么宽阔的新生之路啊!如果我不犯错误,现在我正在大学里学习,但又何必惋惜呢?我不是就要上另一所劳动的大学吗?

密山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祖国的最东北角上,靠近兴凯湖(过去我只在教科书上读到过它)。但这又有什么?男儿志在四方。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温暖的。听说那里的农场是铁道兵团搞起来的,纪律制度比较严,这

① 我当时在中央农产品采购部生产企业局工作。文中的“罐头厂”,是我和其他两个同志负责筹建起来的一个试验性质的小型肉食罐头加工厂。

也好,我正想重新过那使人精神奋发的严格军事生活呢!

也许我把这一切都想得太好了,但我相信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我感到我现在像七年前参军时一样,怀着既兴奋又有点迷惘的心情,所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1958年3月23日

早上6点钟起了床,决定去钓鱼台看看。一来是好久没去了,二来是就要离开北京了,应该去告别一下。

今天天气不怎么好,阴阴的,四面都是白蒙蒙的,像露水又像灰尘的烟雾。我走了一会儿,就来到了首都运河的旁边。河水很浅,无声地流着。四周非常寂静,因为还很早呢。河心有一块浅滩,堆积着从上游冲下来的石头块。我走了下去,俯下身一看,原来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块,都有各自的颜色,红的、紫的、灰的、绿的,单色的、带花纹的,真美极了。我禁不住就挑选起来,不一会儿,两只手就捧得满满的了。我要带着这些从北京运河底上拣来的石子,到东北去。让它们时时促使我想起亲爱的首都!

从河心走上来,我继续顺着河岸向前走去。前面出现了一个工地:运土的轻便轨道、斗车,倾倒在路旁的土堆,和深深陷下去的大坑,(这些)都告诉我,这里曾经进行过紧张的劳动。而现在一切都静静地待在那里,只有工地的大喇叭在播送着音乐,抽水机在嘟嘟地响着。啊,是的,我听说过在钓鱼台要修一个小型的水电站,想不到已经初具规模了。深深的大坑想必是挖的坝基吧。等我再回到北京的时候,水电站一定早就向首都人民贡献光和热了。

工地的入口处写着“禁止入内”的字样,我只得离开河道,绕进了钓鱼台原有的湖泊旁边。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一片平静的湖水倒映着四周并肩而立的树木,那些站在水中的柳树和杨树一动也不动,好像在倾听着从工地那边传过来的音乐。稍远一点的树,被淡淡的白雾把轮廓抹得有些模糊,更远处只是些朦朦胧胧的灰色影子。这一切真像是一幅素雅的水墨山水画,安详、宁静,使人心神怡然。我站在湖边,呼吸着带有水香的新鲜空气,

看着这清新的晨景,听着悦耳的音乐,想着钓鱼台美好的远景,心里真是感动极了。我想,生活啊,生活!你真是无限的美好。特别是今天生活在我们的祖国更是多么幸福!

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她,都会使你神往。错误、痛苦、失望、悲伤都统统去它们的吧,伟大的充满生气的生活在向我招手!

1958年3月24日

昨天会见了澜姐^①。我告诉了她去东北劳动的事,她也很赞同。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犯错误的事,不过,看来这事将来一定会被揭穿,因为她们医院也有人下放到那里去了。怎么办呢?我有什么脸去和亲人,和往日的同志相对?

1958年3月25日

关于我要离开的事,我一直没有对罐头厂的同志们谈。我怕会引起大家的议论,或者引来种种的询问,而我无言对答。我甚至想不告而别。因为我没有勇气面对大家信任和亲近我的目光。分别时亲切的问讯和嘱托,只会更加刺痛我的心。我这次去劳动,不能和光荣的下放相提并论,因此,我没有权利接受同志们的热情话别。

可是,今天再不讲,明天我就打算不到厂里来了,不辞而别我实在做不出。下午,我只好和纪科长谈了,他有些惊奇。我没有让他多问,就把工作向他交代了。到了车间的小楼上,我又向鲍师傅和王杰庭等谈了。他们起初都不相信,后来纪科长作了证,他们信了。不过,他们从工作出发,想挽留我,感情也挺真挚。事实上我走了以后工作上是有影响的。可他们哪里知道其中的内情呢?他们越说我越是感到难过,要是我不犯错误,大家在一起工作多好,但是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去参加体力劳动是我应该走的一条大道,这是不能变更的。我心里纷乱得很,同志们诚恳、真挚的话语,只

① 澜姐是我的二姐。1951年和我同时参军。当时在北京301医院工作。

是使我更加惭愧和不安。我告别了出来。

晚上7点多钟,离开了厂。我回头望了望:生肉整理车间里灯火通明,晚班的工人同志还没有下班。再见了,罐头厂;再见了,我的亲爱的同志们!

1958年3月31日

几天来,除了下午有半天是参加下放劳动人员的学习以外,都是一个人在北京城里转来转去,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好几种感情混合在一起,不知是喜还是悲。去东北,这是我愿意的,当然叫人高兴。可是,想到是为什么而去,以什么身份去,心里又难受得慌。脑子里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情绪翻来覆去地调换,一会儿也没空闲。要克服悲观颓废的思想,还需要长期自觉的苦战,否则也许就会被它埋葬!

我要走的事,局里同志差不多都知道了。他们都鼓励我:好好干吧!是的,我一定记着这些对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满腔热情的嘱咐,并决不辜负。

几天的学习讨论,使我的思想提高了不少。比如对错误的认识,我们的组长(原是党员处长)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仅仅从处分上来认识我们的错误,那是很不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啊!另外,关于去劳动的问题,绝不能仅仅是为了摘掉右派帽子。一方面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更高;另一方面,去劳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仅仅为了个人。从这次讨论(我)联想到组织上对我们的处理,真是太恰当了,关怀得真是太周到了。处理很轻,让我们去劳动,走之前还作思想动员,组织学习讨论,卸包袱,解疙瘩,让我们再受一次教育,使我们心服口服,从心里感激党。我想,若是单从组织方面来讲,“肃反”后转业时,部队组织上也能像今天这样周到地处理我们,也许我不会犯这个错误的。

上午,看了一场新片展览周展出的影片《乘风破浪》,彩色故事片。尽管影片还有许多缺点,但那三个幸福的姑娘,却引起了我的深思。她们走的是一条多么平坦的道路,而我走的却是一条弯曲的坎坷不平的小路。几年来总是迈着踉跄的步子,今天终于摔了跤。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明天是使人充满希望的。不论我经历的是怎样崎岖的“苦难的历程”,最后一定

要走到目的地——共产主义。

晚上8点钟,我带着随身的行李,到大礼堂去集合。9点钟人到齐了。人事局的陈局长给我们讲了话,对我们提出了几点要求,也关照我们一些注意事项,比如防寒等等。9点半坐上汽车前往前门车站。我又一次这样悄悄地离开了一个工作岗位。这情景和前年离开部队时有些相似^①。人走了,留下的是惭愧,没人送别。但愿这一生中这是最后一回……

组织上照顾得很周到,给买了卧铺,一人一个。10点半列车离站,我们踏上了遥远的旅途。躺在卧铺上,看了一会儿书,就睡着了。

1958年4月1日

早上5点钟醒来,见天还没有亮,便想再睡,但再也睡不着了。各种念头在睡着时都消失了,可是一醒来,又都出现在脑际。密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到那儿干什么工作?那里的同志们会怎样接待我们?想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有时让我高兴,有时又让我不安。这种对新地方、新工作充满希望,又有些多虑的七上八下的心情,是自从决定我去密山以后经常出现的。恐怕只有到了那儿以后才能安下心来。

6点钟车到山海关,我起来了。但并没有心情去眺望长城和城楼。一来我这是第三次出关了;二来现在不是玩赏风景的时候。以后沿途经过的各站,我都没有加以注意。

在车厢里闲聊的时候,大家又谈到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密山到底有多冷?有的说并不十分可怕,有的说得做好物质和心理的准备。据说,脚和耳朵最容易冻坏,耳朵有冻掉的。对这一点我真有点担心,因为我的耳朵和脚在北京就怕冻。有的人说,密山那里野兽很多,还有蟒蛇什么的。我觉得这倒并不可怕,反而有点惊险的意味。

晚上9点零2分到达长春。在这里要换车到哈尔滨,然后再从那里换

① 1955年我在部队的“肃反”运动中,因受哥哥曾卓“胡风集团案”的株连,隔离审查大半年后,被转业到地方工作。

车到密山。从长春开车的时间是11点半,因此我们在站上的候车室等了两个来钟头,到站外的饭店吃了一碗面,在车站广场上逛了一下。广场上有一个光荣塔,上面有许多先进工作者的相片。因为天黑看不清上面的题字。长春的街道听说是很优美的,可惜我们不能去观光了。不过,就从车站前往四处看,也可以看出街道的确不错。长春的气候并不怎么冷,和北京差得不多。

1958年4月2日

从长春到哈尔滨的车很挤,站着走了几十公里才找到座位。伏在车窗旁的小桌子上过了一夜。早上6点半到了哈尔滨。到密山的车7点50分开,所以我们没有出站,只在月台上远望了一下哈尔滨车站上的风光。

7点半钟我们登上了去密山的慢车。原来我以为这是始发站,座位一定不会有问题,可实际情况比从长春来时还要糟,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每个两人的座位上都坐了三个人,过道上站着的人还是不少。我上得晚,自然没找到座位,起先在洗脸的地方呆了一会儿,又伏在行李上打了一会儿盹,以后就找到我们一块儿来的人那里,几个人轮流坐一条座位,就这样一直到牡丹江。

在这趟列车上,原来大部分人都是去密山农场的转业军官和家属,陆、海、空军都有。另外还有一些迁去那边打鱼的渔民。嘈嘈嚷嚷挤满了整个车厢。这情形正像同座的一位坦克兵少尉说的那样:这跟苏联人民到东部去垦荒一样。列车上的广播员在扩音器里向前往北大荒的军人们致敬,还朗诵了一首由车上一位军官写的诗,题目是《给去北大荒的英雄们》。车上的人都在热烈地谈论着北大荒的今天和明天。“苦战三年,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这就是主要的话题。这一切使我心情激动,因为我看到,现在我是被卷入了一股生活的洪流里来了。光荣而艰苦的事业摆在我们面前,等待着坚强的人去为它而奋斗。

下午6点50分到达牡丹江市。为了解决人多的问题,铁路局在车尾又加挂了两节卧铺车厢。我去晚了,只找到一个上铺,还放有别人的行李。我

弯着身子就凑合着躺在上面睡着了。

1958年4月3日

清晨3点多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密山。车站上一片忙碌的景象。农垦局接待委员会的同志,忙着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新的农场成员。广播喇叭里播送着一份总后勤部下放人员的决心书。这对大家好像是一种挑战。

4点钟的光景天就亮了(在祖国恐怕要算这里的土地最早接受阳光)。提着随身携带的行李,我们出了车站。迎着车站的大门有一座红色的牌楼,上面写有一副对联:“杜佳以东三年开荒百万亩,完达山区千里沃土大翻身。”真的,来到这样一个充满劳动英雄气概的地方,怎不叫人兴奋!又令我们怎不感到羞愧!特别是我这个曾经穿过军装的人。

穿过一条东西向的大街,我们来到了密山剧院。从外表看这座红色的大厦倒蛮不错,比起北京一般的剧场并不逊色,可是内部却比较简陋。坐这趟列车来到农场工作的人,全部都暂时住在这里,明确一点说,是住在剧院的走廊和休息室里。几张席子就地一铺,就成了床。这种游击式的生活我倒很喜欢,来这儿是垦荒的,若是让我住漂亮的旅馆,反而会不舒服的。

中午吃的是大米饭。也许是饿了,也许是米好一些,吃得特别香。

密山镇内住着不少朝鲜族人,女的都穿着裙子和肥大的裤子。携带东西使用头顶的方法,木柴、粮食、包袱等都是顶在头上,手也不扶,看上去很稳当,似乎也不太吃力,不知这种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下午,组长们去车站看托运的行李,结果是还没到。这样我们就走不了,说不定要住几天呢。傍晚,以小组为单位漫谈了一下出发以来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大家都认为:当前我们应该打掉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做好过更艰苦的生活和更加紧张劳动的思想准备,打起精神走上新的劳动岗位。目前普遍存在着的或多或少的自卑感是有害的,应该尽力加以克服,否则就会害了自己。

晚上剧院的过道里很冷,我们又都没带被子,考虑到这个情况,接待委员会另外在一家酒厂里找了两间房,让我们搬了过去。这里比较暖和,有一

个火炉,睡的还是席子,不过下面垫了一些稻草,这就很不错的了。

1958年4月4日

早上5点半起床,因为6点钟就开饭。

吃完饭,在屋里拉了一会儿手风琴(这是我离开北京时用全部积蓄买的)。闲得无聊,就上街去遛了一圈。

大街上满眼都是黄军装。在商店里绝大部分的顾客也是军人。这个小城市的新居民,还在不断地从全国各地拥来,在这里待上几天,又分头出发到荒原上去。密山镇成了垦荒大军的中转站。在百货公司和零售小商店里,农场的新主人们买着皮靴、皮帽、褥子、胶鞋、便衣等自己认为必要的东西。有的军官家属,更挎着篮子,拿着瓶子,买咸菜、酱菜和各种调味品。显然她们是抱着一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就立刻安排好新的家庭生活的决心。

这里的东西都比北京贵,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因为这些东西大部分要从外地甚至关内运来。猪肉很少,饭馆里的菜单上写着:“炒菜一律狍子肉”。(狍子是这里一种类似鹿的野生动物)

在接待委员会新盖的饭堂里,墙壁上贴着很多振奋人心的标语,还有带图解的快板词,描绘着农场美丽的远景。我把它全抄下来了。按顺序排下来是这样的:

“平均亩产量,两年打进关;四年跨黄河,六年过长江。八年六吨半,决心要实现。

“二年机械化,三年电气化,两化加一化,农业现代化。电灯电话村村有,有线广播村村架,生产生活都用电,边疆开遍幸福花。

“变水害为水利,变死水为活水,变沼泽为良田。兴建中小型水库,防涝灌溉带发电。

“森林业齐头进,抚育又更新,绿化环境保护林,大家种植万万根。五年后,各种果子吃不尽!

“畜牧业劲头足,五年养猪百万口,鸡鸭千万只,乳牛百万头,毛用皮革兔,饲养百万只,改良大种马,一头抵三头。野生动物也饲养,银狐、貉子、梅